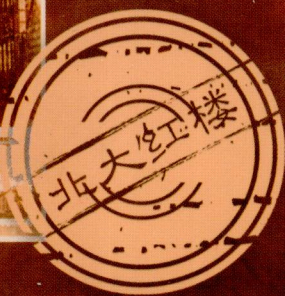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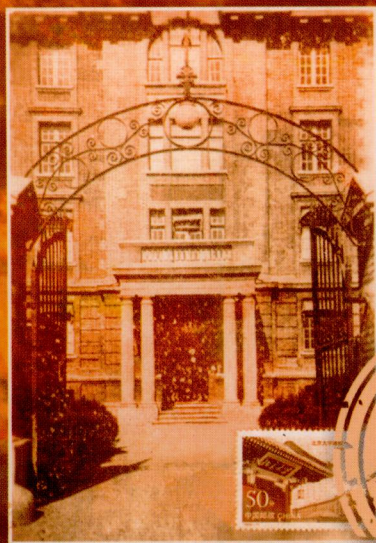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 在1949

献给建国60周年

◎ 张高杰/编著



人民出版社

知识分子 在1949

献给建国60周年

◎张高杰/编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封面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在 1949/张高杰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01-008106-9

I. 知… II. 张…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437 号

知识分子在 1949

ZHISHI FENZI ZAI 1949

张高杰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08106-9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引言

毫无疑问,1949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岁月:

1月,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和平建议”。随后,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由南京飞奉化幕后指挥。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活捉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及伪市长杜建时。傅作义率部20余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3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倒台。

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庆典。

11月,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遵义、桂林、梧州、柳州、重庆。

这是历史的进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了辉煌的顶峰,而她的对立面——国民党蒋介石则不

可避免地走向失败，黯然退守台湾。然而没人能知道，60年前的这场世纪变革，使多少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因此发生改变。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按照许纪霖的说法就是指现代社会中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①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标本，是社会的晴雨表。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变动最敏感，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最能体现社会深层价值的延续或转换。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宿命般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黏合在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个人命运。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为了找到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东渡台湾，有的西行入川，在那一幅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演绎各种各样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的激动兴奋、苦闷彷徨、恐惧无奈，真是一言难尽！

最终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为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特殊的社会现实和天然的禀赋决定了他们永无休止的多种命运。特别可敬的是，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他们甘愿为自己的信念而赴汤蹈火。

这里笔者选取了9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只想拂去历史的尘埃，呈现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或辉煌或落寞或悲凉的人生。审视这段生命历程就是审视20世纪的中国，缅怀这段生命历程也是那个伟大鼎革时代最好的纪念……

参考书目：

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胡适:破灭的自由梦	1
---------------------	---

12月14日的晚上,在城内东厂胡同自己家里,胡适简单地整理了自己的行李,是夜,胡适还给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第二章 沈从文:从狂言呓语到恢复新生	31
--------------------------	----

1949年1月2日,沈从文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令人惊心动魄的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最高点”,也即是说,已经到崩溃的边缘,再下去,就要毁或者疯了。

第三章 吴宓:在保守和浪漫之间	61
-----------------------	----

1949年开始的新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强烈个性的吴宓虽然没有预想到将会面临什么,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对他来说,离开这块土地是不可思议的。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是否有过彷徨、犹豫、挣扎,因为他在“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际写的日记被毁,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

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对“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四章 胡风:文学殉道者 87

1949年11月,长期以来一直自视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胡风先生,意气风发,挥笔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凡4600行,热烈欢呼新时代的来临,气势磅礴如同“大型交响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时间并没有开始。

第五章 老舍:海外归来的“人民艺术家” 114

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第六章 周作人:狱外的平淡人生 140

1949年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第七章 叶圣陶:涓泉归海的“知北游” 167

1949年2月,叶圣陶等从香港北上。30多年之后,叶圣陶对当时在船上的心绪与感受仍记忆犹新:“知北游”中“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却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第八章 郭沫若:新中国的第一文人 190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郭沫若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向毛泽东敬献锦旗:我们永远跟你走。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郭沫若曾经当作国歌歌词来写的诗歌《新华颂》。这是郭沫若这位新中国第一文人,以自己最为擅长的文学形式给新中国写就的华美赞歌。

第九章 丁玲:来自延安的小号兵 215

丁玲在她的回忆性散文《北京》里,曾经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话:“四十年代末,我随着革命大军凯旋来到京城。鞭炮响彻了天安门。人们的心呵!像飘游在碧空的五彩红云。光明在前面,希望在前面,幸福在前面,人民的心结在一起,人民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我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

后 记 241

12月14日的晚上,在城内东厂胡同自己家里,胡适简单地整理了自己的行李,是夜,胡适还给北大文学研究所主任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续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回南京,说政府要重起炉灶,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第一章

胡适:破灭的自由梦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不禁潸然泪下,相对凄然。伤心人别有怀抱。胡适如此动情,是因为此诗足以传达他末世的哀伤。这种哀伤不仅仅指的是国民党政权的败亡所带来的对个人前途的迷惘,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是于1948年12月15日夜从北平飞到南京的。

1948年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到21日,北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开始准备他的“双抢”计划:一边考虑“抢救”黄金,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一边开始“抢救”人才。“抢救”人才计划,由蒋介石本人直接策划指导,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实施。“抢救”对象共分四类:一是各院校馆所有关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者。他要把能动员走的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送往台湾。物质不能留给共产党,人才更不能留给共产党。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旗帜,自然是蒋介石要抢救的首批人才。

12月13日,蒋介石特派青年部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去劝胡适:“北平的城防一天一天地接近,不如早点离开!”但胡适此时却强装镇静,信誓旦旦地说“中共的叛乱和日本的外患不同,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①言语之中,仍显示出对国民党的实力抱有幻想。陈雪屏随后飞回南京复命。蒋介石得知胡适的态度后,仍不甘心,于14日再次派专机飞往北平,强行接人。胡适当天的日记说:

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并没有机来。

十点到校,见雪屏电:“顷经(按:蒋经国)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

毅生(按:郑天挺)与枚荪(按:周炳琳)均劝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

^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061页。

我十二点回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①

其时，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到了北平上空时，西苑机场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只有南苑和天坛临时机场可用。形势已变得越来越紧张，这回胡适改变了上次的态度，变得焦虑起来。他知道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胡适打电话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走，被陈拒绝。连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坚决要求留在北平，不愿同行。胡适夫妇不胜惊愕，问其原因，思杜说：“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最后只有陈寅恪等少数人愿意跟胡适南飞。而陈寅恪后来留在广州，并未随国民党逃亡台湾。当时陈只是感到北方生活不习惯，想到南方去。他完全不过问政治，对国民党政权也没抱任何希望，这一点和胡适是不同的。

12月14日的晚上，在城内东厂胡同自己家里，胡适简单地整理了自己的行李，很多书籍和手稿无法带走，他只能拣些重要的带着，其中包括他正在校勘的几部《水经注》稿本和他独自占用的《脂砚斋朱批石头记》16回抄本。夫人江冬秀估计以后与儿子思杜相见会很难，就留下许多值钱的金银细软，再三叮嘱这是给他将来结婚用的。令胡适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9月22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斥责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并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1957年，36岁的胡思杜自杀于唐山。世事难料，造化弄人，父子此别竟成永别。

是夜，胡适还给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

①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6—727页。

大。”^①写完此信，胡适感到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等待逃亡的焦虑折磨着他，使他难以入眠。夜阑人静，室内灯火阑珊，窗外月明星稀。他披衣出门，独自踱步庭院，听远处风声鹤唳，楚歌四起，此时此刻，他只有时而举首望月，时而扼腕长叹。^②

第二天上午8点，胡适到勤政殿傅作义的总部等待飞机。此时傅正在和共产党代表举行和平谈判，他觉得自己与胡适是旧交，且胡适执意要走，于是便放行。

12月15日下午，胡适夫妇和陈寅恪、黄金鳌、毛子水、英千里、钱思亮、袁同礼等人在傅作义的卫队护送下，到南苑机场登机起飞。临行前，胡适匆匆看了北平最后一眼，古都含黛，草木萧然，暮色中的西山，依稀可见。今朝别离，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徒令人百感交集。屈指算来，这已是胡适第三次告别北平了。

胡适日记对这一行程有详细的记载：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③

胡适夜里10时左右，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随后被安排住在教育部准备好的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里。12年后胡适给蒋介石的信里提起此事说：

① 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00页。

②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③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7》，第727页。

……回忆卅七年十二月十四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到北平接内人和我同几位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做生日，十二年过去了……^①

言下之意充满感激。

胡适确实已经跟蒋介石走得太远。作为政客的蒋介石这样对胡适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胡适经常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蒋手中的一颗棋子而浑然不觉。譬如，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作为“国大代表”前往出席。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称“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胡适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也想试一试，但又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一度决定接受蒋的“提议”。到4月1日一觉醒来，也许他的头脑又清醒了一些，“还是决定不干”。

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而胡适却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最后，胡适还是高高兴兴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

^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63—2064页。

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①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当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试图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教授吴晗也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1948年8月,吴晗辗转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吴晗向毛、周谈到北平地下斗争及高校情况时,毛泽东曾经很明确地这样说。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羨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②结果胡适还是一意孤行,如过河卒子拼命南下,依附于国民党政权。于是中共方面便在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① 张柔情:《胡适在北平的最后时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1083e20100d6ww.html。

^② 李远江:《北平:围城中的去留抉择》,《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1期。

后宣布他为战犯。

二

胡适有着浓厚的“北大情结”，逃到南京后的胡适，仍以“北大”校长自居。

1917年，刚刚回国的胡适，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他毅然谢绝了多方邀请，来到北大任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在北大，他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培养出了傅斯年、顾颉刚等著名弟子。1925年，胡适赴美考察，暂时离开北大，直到1930年重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此后7年间他和蒋梦麟校长齐心协力，把刚从解体边缘复活过来的北大“中兴”成国内顶尖大学。他筹集经费、搜罗人才、兼任多职、开设课程，可谓殚精竭虑。直到1937年重新赴美争取外交支持，再次告别北大。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傅斯年给蒋介石的信中曾说：“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与情之美，则全国教育界，亦必以清时佳话而欢欣。”胡适任北大校长消息一公布，北大内外确是欢欣鼓舞，一片唱赞。著名学者教授纷纷致函致电胡适，表示内心的仰望与欢悦。

胡适对卸掉驻美大使的职务后，能回国执掌北大，也很高兴，归国途中就多次写信给国民政府，希望用“十年的时间让学术独立发展”，再造北大。可惜他的宏愿终无法摆脱时代的冲击，最后不得不凄然离开北大。他在最后一次校务会议上仍坚持“北大只有留在北平，否则还能叫北京大学吗？”他对北大的感情，是超越政治的。

1948年12月13日，即将离开的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

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工作，努力奋斗。”^①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50周年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言语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这天正是他58周岁生日。陈雪屏于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②

恰巧也正是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个“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颇有气氛。出版了“纪念特刊”，举行了各种学术讲演与多种展览。其中关于北大校史展览的第三部分，还陈列有胡适的日记、《尝试集》初稿、初期白话诗稿印本、魏建功文、钱玄同书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平话”长幅，以及胡适1937年9月9日给北大同人的那封别具一格的告别信等。

1949年1月1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③他多么希望能再回到北平，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2页。

② 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701—702页。

③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7》，第731页。

回到北大。1月24日胡适写信给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坚辞“总统府资政”，声称他现在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而不能兼任其他差事。

他也确实在履行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职责，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翻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于是就打电话去问梅，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解释，三十分钟后焦增煜就被释放了。出狱后焦增煜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情况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为他出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 卅八年三月九日^①

就凭着这张证明书，焦增煜才能漂洋过海，最后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学习。

3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为人题画册的感想：

为吕平得君题《石涛画册》。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②

胡适写这话肯定是因为与石涛心有戚戚。他已预感自己将成为民国的“遗民”，也许再也回不到北大了，但和石涛一样，他也是一个永远“不肯抛弃希望”的“遗民”。3月14日他得北大同事的两封来信，日记中

^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77页。

^②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7》，第749页。